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满
族
社
会
历
史
调
查

辽
宁
人

2.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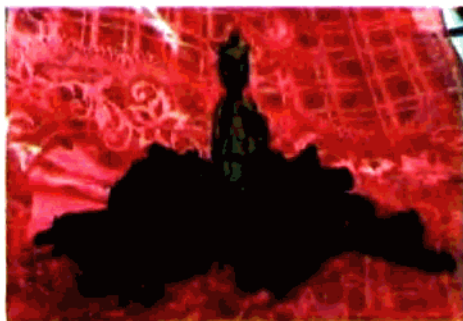


沈阳故宫清宁宫
萨满祭祀神堂

萨满系的腰铃



八角鼓



“佛陀妈妈”及子孙绳



祖宗匣中的“七人八马”



满族家中的婴儿摇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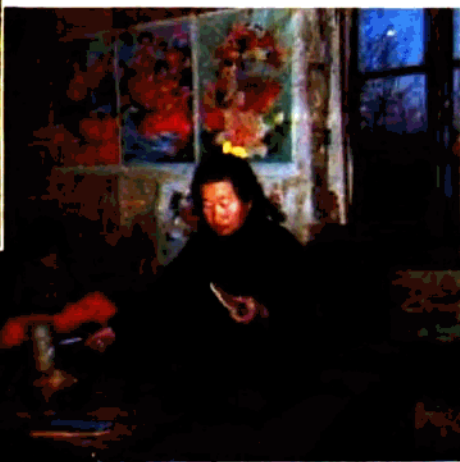


做豆面饽饽



抓嘎拉哈游戏

一个普通的满族农家





辽宁新宾县烟筒山下，苏子河畔。
(满族发祥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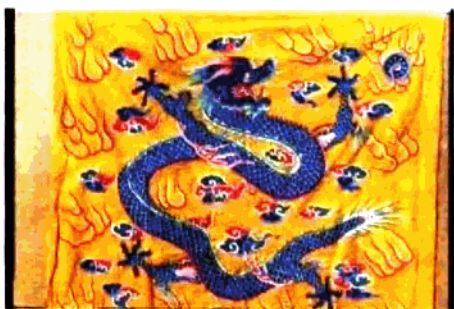


赫图阿拉城遗址 (今新宾县老城)

后金东京城遗址
(今辽宁辽阳市郊)



沈阳故宫



八旗旗幟（左排自上而下：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右排自上而下：正黃旗、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一九五六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九五八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大多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目 录

满族简介	1
辽宁省沈阳市满堂乡满族调查报告	14
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外和睦村满族调查报告	33
辽宁省凤城县满族调查报告	48
北京市满族调查报告	81
陕西省西安市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139
内蒙古自治区满族社会历史调查	149
甘肃省满族社会情况调查	159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满族人民历史概况	16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满族调查报告	167
四川省成都市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179
广东省广州市满族情况调查报告	190
山东省益都县满族调查报告	201
辽宁省兴城县满族调查报告(节选)	204
黑龙江省爱辉县大五家子乡大五家子村满族调查报告(节选)	211
河北省青龙县肖营子满族调查报告(节选)	226
河北省易县周家庄满族调查报告(节选)	23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满族工人调查报告(节选)	236
辽宁省旅大市满族工人调查报告(节选)	237
辽宁省抚顺市满族职工调查报告(节选)	240
后 记	251

满 族 简 介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在祖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满族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有4,299,159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以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省及北京市为多。辽宁省是满族人口最多的省份，有1,990,931人。其他如内蒙、河南、山东、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以及成都、西安、广州、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满族人口也不少。

东北三省和河北省的满族人民80%以上从事农业，这些地区盛产大豆、高粱、苞米、粟米、烟草、苹果和柞蚕。东北的偏僻山区还盛产人参、蘑菇、木耳，因此采集也是山区满族的主要生产活动之一。城市里的满族，在工矿企业中人数较多，在知识分子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一)

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满族的先世很早以来就和中原地区频繁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肃慎人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生活在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传说中的舜、禹时代，他们就和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向周王朝献过“楛矢石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朝的“北土”。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他们活动的地区大致包括今辽宁省东北部、吉林省全部和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省东部及黑龙江以北的辽阔地带。挹娄人也用“楛矢石砮”猎取野兽，种五谷，长于养猪，能织麻布，会造小船。三国以后，挹娄人屡次来贡“楛矢石砮”，直接臣服于中原王朝。“挹娄貂”在三国时是中原社会上的御寒珍品。

四世纪到七世纪（南北朝、隋、唐时期），肃慎、挹娄的后裔，相继以勿吉、靺鞨的名称出现，人口发展多达数十个部落。靺鞨后来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

拂涅、号室、黑水等七部。

七世纪末，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出现了一个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渤海政权。渤海与唐朝联系密切，国王更换，皆受唐朝册封。

渤海建国的前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黑水军，随后设黑水府，分别授予黑水靺鞨各部首领都督、刺史等官，并置长史监之，赐姓李氏。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成为唐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置的直属地方机构。当渤海强盛时，部分黑水靺鞨人为其部属。辽亡渤海后，南迁渤海部民，黑水靺鞨随之向南伸张，逐渐取代渤海而兴。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此后，女真这一称呼代替了靺鞨。

十二世纪初，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抗辽朝奴役取得胜利，建立了金国政权，并先后取代辽和北宋，成为与南宋并立的王朝。大量迁入中原地区与汉族杂处的女真人，后来同汉族逐步同化了。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灭金，女真人受元朝统治。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以今之黑龙江省依兰为中心，分布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以及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元朝在这里“设官牧民”，通过本族上层“随俗而治”。当时，这些女真人大致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十五世纪以后，明朝在女真人居住的东北地区，北起外兴安岭、东极于海以至库页岛，西南包括吉、黑两省地方，先后建立了384个卫、所。同时，在奴儿干卫女真首领忽剌冬奴等人的请求下，于黑龙江与恒滚河汇合口对岸的特林地方，设奴儿干都司，为直属明朝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明朝封女真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使、指挥僉事、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敕书、印信、衣冠和钱币，并规定朝贡与马市的时间和待遇。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直属统治，促进了女真和汉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明代，女真人逐渐南迁。建州女真各部迁至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迁徙后，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东海女真（明人称野人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建州、海西两部南迁定居后，以农业为主，社会上已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对立的阶级关系。东海女真发展则比较缓慢。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建州、海西分散的各部之间，经常征战，形成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建州左卫的首领努尔哈赤顺应形势的需要，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

1583年，努尔哈赤被明朝封为都指挥使。1589年，被封为都督僉事。1595年，又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经常来往于抚顺马市上，又曾多次到过北京，熟悉汉区情况，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努尔哈赤具有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从1583年起兵以后，在短短三十多年中，把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流域、南至鸭绿江分散的女真人全

都统一起来。

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建立了牛录——八旗制度。牛录原是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出猎时，各依所属的族或寨行进。每十人以一人为首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所属九人听他指挥。努尔哈赤把从战争合并来的各部落诸申（贵族、官员以下、奴仆以上的阶层）、伊尔根（平民、百姓）统一组织起来，规定三百人编一牛录，每牛录设一牛录额真（佐领），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构成一个“固山”即“旗”，首领为固山额真（后称都统）。1601年，努尔哈赤建立黄、白、红、蓝四旗，1615年又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努尔哈赤指定子侄作为他的代表，分统八旗，称为“固山贝勒”。固山贝勒既是本旗的所有者，又是本旗的最高军事统帅。八旗制度具有军事、政治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

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称“英明汗”，建立了奴隶制政权的“金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统治期间，由于统治区域的不断向南向西推进，政治中心曾几次迁移，1621年由赫图阿拉迁至东京城（在今辽阳市郊），1625年又迁至沈阳。1626年，努尔哈赤死，其子皇太极继汗位，1636年，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在这以前，后金称女真人为“诸申”，称汉人为“尼堪”。统一后，女真各部需要有一个新的族名；另一方面，随着女真人内部阶级的分化，大多数诸申处境日益恶化，地位不断下降，严格依附于汗、贝勒。于是在皇太极称帝的前一年，即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诸申（女真）的旧称，定族名为满洲。

皇太极统治时期，在汉族封建社会制度的影响下，满族社会由原来的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转化。随着所辖汉人和蒙古降众的增多，从1633年起，先后增编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它们与满洲八旗共同构成八旗制度的整体。八旗制度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

满族就是这样由女真人逐渐演化而于明代末年形成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是构成满族的核心部分。因为满族完全隶属于八旗制度之下，所以也自称为旗人。

（二）

满族社会的基层行政组织是牛录。牛录额真以上的各级额真直至贝勒、汗是这个社会的大小统治者。满族入关前，八固山贝勒是满族奴隶主贵族中的特权集团，他们支配着社会上的全部财富，并把绝大部分据为己有。1621年，努尔哈赤下令计丁授田，满洲每丁授田六垧，受田后，“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满族自由民即牛录下的八旗壮丁，依规定三丁抽一，披甲当兵，余者务农、狩猎、交纳贡赋。战争频仍时，则都要应征入伍，这就是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八旗兵丁出征时，需自备马匹、器械、粮秣，实是承担着繁重的军事徭役。除自由民外，满族八旗兵丁也有因负债、犯罪等原因沦为旗下奴隶即称为“包衣阿哈”的。

1644年，清军入关，清定都北京。当时除部分满族留在东北外，大批满族陆续进入

关内。最初主要聚居于北京及京畿，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八旗兵被派往全国各重镇驻防，家属也随军迁往，于是满族开始分布于全国各地。八旗兵丁则被驱使转战南北，直到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后，他们的生活才基本安定下来。

入关后，满族贵族在畿辅各地扩大农奴制生产方式，圈占了畿辅汉民田地166,766顷。其中一部分被满族皇室、王公、贵族占有，建立了农奴制庄园，称“皇庄”和“王庄”。另外，大部分赐给八旗官员、兵丁，叫“官员田庄”和兵丁“份地”，通常称为“旗地”或“一般旗地”，以与“皇庄”、“王庄”相区别。

清朝皇帝、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员占有大量土地和人丁，设置庄头，驱使庄丁耕作，征收租谷，金派繁重杂差。同时，还通过俸饷制度剥削全国人民。

满族人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旗地和粮饷。但这时八旗兵丁因军差兵役日重，根本无暇耕种旗地。旗饷制度虽然曾给八旗兵丁带来相对优裕的生活，但伴随着旗饷而来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旗人更严格的人身束缚和控制，旗人将永远充兵服役，不准务农，不准经商，甚至不准随便离驻地外出，使旗人陷入了反动统治阶级安排的“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赖饷而食”的寄生生活的深渊。

八旗本来兵有定数，饷有定额，康熙中叶以后，八旗人口日繁。闲散余丁日增，致使他们无谋生之路，只能靠父兄的粮饷生活，或靠借债典当度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财政枯竭，八旗兵丁的粮饷时无保证，生活常现困窘。十九世纪中叶，驻防旗人竟有“衣敝履穿”、“赴乡乞食”者，西安旗人一年之中便“饥毙男妇子女六千六百五十四名之多”！

辛亥革命后，旗营解散，粮饷停放，八旗制度彻底破产，平日只知当兵吃饷的八旗兵丁开始了痛苦的转化历程。那些家资比较殷实的清朝遗老，尚可靠变卖房产、珠宝、字画过活，而大部分满族人民则穷困无着。他们不会经商，一时又学艺难成，故多成了出苦力的工人、车夫，或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北京、成都、西安、广州等许多城市的满族市民以贩卖香烟、瓜子、冰棍、泡菜或缝补浆洗为生，他们经济力量微薄，生活十分贫困。一些有文化的人做了教员或小职员，有的拜师从艺。但他们的工作也很不稳定，工资微薄，经常失业，加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物价上涨，纸币贬值，日子很不好过。不少地区满人为谋生计，四处流亡。如在清朝后期，杭州尚有一个叫“二百户”的满族聚居区，可到解放前夕，已荡然无存了。

关内农村满族人民的生活也很贫困。北京郊区密云县穆家裕乡檀营村原是满族的一个聚居点。这里最初的满人是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调来的旗兵，担当皇帝到热河去避暑或狩猎途中的保卫工作，到清末已发展到二千多户。但在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檀营成了“叫花子营”，满族人民卖儿鬻女、死病逃亡，悲惨万状，到后来只剩下二百多户，而且都是贫困之家。

清代东北八旗兵丁基本保持亦兵亦农的生活，但遇有战事，征调也很频繁。乾隆后期，关内一些八旗余丁曾被派往东北种地，以开生路。辛亥革命后，有的满族人尚可依

旗地生活，但在日伪统治时期，他们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野蛮奴役，也备尝了人世的艰辛，不少人惨死在日寇的皮鞭和屠刀之下。流入到工厂、矿山的满族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他们的工资很低，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连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抚顺煤矿工人中流传的歌谣说：“一到千金寨（抚顺），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工伤事故多，老婆孩子无依赖。”这是解放前东北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

历史上，满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满族及它的先世生息、繁衍于祖国东北，从事狩猎、采集、农业、畜牧等多种生产活动，开发了祖国的东北资源；他们与其他兄弟民族频繁互市，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交流，也加速了本身的社会发展。

从1661年到1729年间，辽宁地区旗人和汉族耕垦的土地面积增加了5倍多。吉林、黑龙江旗人和汉族开垦的土地也日益增加，到乾隆时，耕地面积达61万顷之多。这就使东北地区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有余粮供应关内。其他如柞蚕、人参、鹿茸的产量也有增加，这是满、汉族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

1667年康熙帝亲政以后，作了一些改革，如永停圈地，实行奖励农民垦荒等项政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因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获得比以前较好的生产条件，全国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十八世纪中期，全国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手工业产品都有显著增加和提高，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超过了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康熙中期以后，在反对分裂祖国，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统一，保卫边疆的斗争中，满族起了很大作用。

康熙帝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坚决消灭了“三藩”割据势力的叛乱。满族的男丁大批参战，就是远在东北三省的八旗人丁，也陆续调往前线，巩固了全国统一的基础。与此同时，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勾结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汗进攻内外蒙古。康熙帝亲率八旗兵迎击，打败噶尔丹军队。从此以后，经雍正以至乾隆的七十来年的斗争，摧毁了准噶尔贵族集团的分裂势力。满族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八旗官兵大量开往战场，英勇奋战，对维护祖国的统一贡献很大。

满族在保卫祖国边疆，制止外国侵略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1685年康熙帝派遣满族都统彭春率领八旗兵和水师，保卫领土，保护人民，驱逐沙俄侵略者。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地位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国界，两国保持了一百多年的正常关系。

十八世纪英国殖民者指使廓尔喀统治者，勾结西藏封建主，武装侵略后藏。乾隆帝

派大学士、满族福康安率兵进藏，与西藏人民共同打败廓尔喀军队，保障了西藏边境的安全，粉碎了英国殖民者的阴谋活动。十九世纪初年，英国殖民者又指使张格尔多次进扰新疆边境，道光帝派大学士、满族长龄统率新疆满、汉兵，并调遣东北旗兵往援，活捉张格尔，再一次粉碎了英国殖民者侵占我国领土的企图。

从康熙以至乾隆大大地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巩固了幅员广阔的（北自外兴安岭，南至西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达葱岭）多民族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族人民和广大汉族人民一样，为了保卫祖国独立，维护民族尊严，英勇杀敌，许多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驻守在浙江乍浦观音山脚下天尊庙里的满洲八旗兵，在佐领隆福的率领下，连续打退了英国侵略军的五次进攻，杀伤大量入侵之敌，击毙英军十八团的汤林逊中校。276名满族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守卫在江苏镇江的八旗兵1,500余人，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和洋枪、洋炮，寸土不让。革命导师恩格斯曾赞扬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遇到同样的抵抗，他们就不会取得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殖民者强占我国东北边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里的汉、满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的领土，反对沙俄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夺占我辽东大片土地，激起了汉、满、朝等各族人民强烈反抗，他们纷纷组织起民团、乡勇，抗击日军。满人魁福、锡寿等是著名的团练之首。在保卫辽阳的战斗中，汉、满人民英勇抵抗，“死战不降”，一月之内接连四次挫败日军进犯，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占领奉天（沈阳）城“度岁”的狂妄计划。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散居在各地的满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奉天省城的大街小巷和附近的乡野村庄，处处在练拳，到处是揭帖。崇信义和团的满族副都统晋昌，率领（育字军）八旗士兵数百名，参加战斗，烧毁教堂，处死了凶恶的法国侵略分子纪隆。河北遵化地区的义和团推举满族农民李虎忱为团头，率领拳民转战遵化各地，向侵略者展开斗争。北京的义和团声势尤为浩大，在攻打西什库教堂的斗争中，满族士兵恩庆击毙了开枪寻衅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义和团运动虽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联合绞杀了，但是广大汉、满人民显示了无比的反侵略的决心和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中，广大的满族人民赞同和拥护革命。满人鲍化南、何秀斋与革命党人宁武等领导了辽宁凤城等地的武装起义，为革命而牺牲。满族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宝昆、田亚斌与同盟会员张榕（汉军旗人），在奉天组织了“联合急进会”，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他们虽然被清政府杀害了，但他们代表了满族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正确方向。辛亥革命对满族来说，是一件巨大事变，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压在汉、满各族人民身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束缚满族人民的腐朽的八旗制度，解除了满族人民身上的枷锁，这对满族本身的发展也是具有重

大意义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大片土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那里的一二百万满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起，陷入殖民统治的苦难深渊。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满族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幻想借日本帝国主义之尸，还“恢复祖业”之魂，在东北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伪满政权刚一建立，就遭到广大汉、满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满族人民纷纷参加义勇军、抗日会以及红色游击队等抗日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打击日伪反动军队和卖国贼。

1935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成立，转战于吉沈铁路沿线、延边地区、松花江中下游和牡丹江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满族人民大批参加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满族干部就有王光宇、张兰生（鲍巨魁）、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人。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战斗的锻炼和考验，成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

津南抗日武装部队副司令员杨靖远（满族，本姓赵），率部转战于冀鲁边区，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了生命。

北平一带的许多满族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其中不少人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共青团和共产党，在校内外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八路军中满族指战员，随军深入敌后，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同志（满族），与贺龙同志一起在挽回晋西北的危局后，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1938年，他同贺龙同志挺进到冀中，巩固冀中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关向应同志不仅是满族的好儿女，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广大满族人民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战争。中国各族人民经过八年苦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解放区人民，一方面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击，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解放了的满族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关向应同志

关内各地的满族，以各种形式进行反蒋斗争，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贡献了力量。

文化方面，满族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康熙帝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早期满文著作，除《满文老档》、《满文太祖实录》和图理琛的《异域录》等为人所周知的著作外，还有学习满文应用之书，如《清文启蒙》、《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等等。这些书全是用汉文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以及造句法的书。

在满语语汇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译书非常普遍，所有汉文名著，大多译成满文。除官书不计外，民间作品如《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全有满文译本。其中以扎克丹译的《聊斋志异》译文最好。将原书原意神态毕现地译出，文字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满族文化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满族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十七世纪后期，著名的词家纳兰性德著的《侧帽集》和《饮水词集》，清新婉转，生动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十八世纪满洲正白旗包衣管领下人曹雪芹著的《红楼梦》，把我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推到空前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昭槁的《嘯亭杂录》，就其耳闻目见清代前期的制度、仪礼、事件、人物，杂记成书，对研究满蒙史有参考价值。

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是一部经过调查研究写成的关于北京岁时风土的书。《红楼梦》和《燕京岁时记》除在国内流行外，并曾有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

在满族文化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少杰出的女作家。如科德氏著有《琴谱》、完颜悦姑著有《花榭闲吟》、库里雅令文著有《香吟馆小草》、西林太清（即顾太清）著有《天游阁集》。《天游阁集》中的《东海渔歌》词，文学界给以很高的评价，西林太清被认为是清代第一女词人。

十八世纪中期，“八旗子弟”创作了一种新的鼓词，只有唱词，没有说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等城市流传很广，最为一般市民阶层所喜爱，著名的作者为鹤侣和韩小窗。他们著作的子弟书《借靴》、《侍卫叹》、《全德报》、《露泪缘》流传最广。还有一种民间文艺“八角鼓”，唱腔和鼓词，生动引人，直到清末还普遍流传。

满族在科学技术方面对祖国的贡献，除了上述康熙帝钦定的那几部书外，尚有相当数量的满族人的著作和成果。例如乾隆的第五个儿子永琪就是一个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和今天的几何、三角法大体相同。他在算法上造诣很深，在他影响下他的孙子奕绘在算法的精研上成就也很大。满族中这样的数学家是不少的。

清朝的左都御史拉布敦，姓栋鄂氏，是一个“习外国语”又会修理洋钟表的能手。满族的外科医学接骨，在西医石膏绷带法没普遍流行前，在北京一直占主导地位。乾隆

年间满族伊桑阿就是一位整骨专家。

满族人民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善于学习，勇于创造。在他们辛勤劳动的硕果中，有许多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共同结晶。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满族人民遭受歧视、压迫，许多人改名换姓，隐瞒民族成份。解放了，满族人民享有民族平等权利，他们欣喜地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份，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决定。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满族人民，在各级政权机构中都有相应的代表参加。以后，全国的、东北地区的，以及各大城市的历届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一定数量的满族代表名额，满族人民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解放后，农村的满族人民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城市里的满族被政府安排就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工作。这就使满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大道。

解放以来，党和国家认真执行民族团结政策，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截至1982年，仅辽宁省就有满族干部29,230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7,890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满族中的先进模范单位和先进人物不断涌现。

在工业战线上，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也是满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区。东北满族工人，主要分布在钢铁、机械、煤炭、纺织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广大满族工人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为革命钻研技术，出现了不少技术革新能手，有很多革新和创造。他们还积极支援边疆建设，现在我国西北、西南的一些大型厂、矿、企业中，有许多来自东北各大、中城市的满族企业管理干部、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

在文学艺术方面，很多有造诣的满族文学家、艺术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革命青春，为祖国绚丽多采的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著名满族京剧演员程砚秋，艺术上造诣精深，具有独特风格；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抗日战争时期拒绝为敌人演出，退居北京西郊种地。解放后他积极工作，热情培养青年演员，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满族爱国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出身贫寒，备尝辛苦。解放前，他写过《骆驼祥子》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对旧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抗战期间，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他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从1950年到1966

年，共写出了《龙须沟》、《女店员》、《茶馆》等二十几个剧本，批判旧的制度和习俗，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老舍先生虽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但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人民艺术家”。



老舍先生

满族语言学家罗

常培，热爱祖国，秉性爽直，富有正义感。他在汉语音韵学、古代汉语音类的分合、读音的构拟和音系发展的历史、汉语方言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突出的成就。解放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以毕生的精力发展了汉语语法、音韵、方言、词典编写和语音实验等工作，大力提倡和推进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新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满族人民在国画方面也有很大成就。“东方红”国画就是满族画家创作的。表现了在党的领导下，祖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壮丽图景。工艺美术也是北京满族老艺人的特长。但在解放前，工艺美术凋零衰落，很多老艺人被迫改行谋生。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北京市著名的“面人郎”、“泥人唐”、“花脸金”等许多满族老艺人又发挥了祖传的工艺特长，制作出许多受到国内外欢迎和喜爱的工艺品。满族艺人还擅长玉雕、核雕，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刻画出解放后祖国在各条战线上出现的崭新面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正确经济政策指导下，农村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满族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改善。下面仅举两个最普通的例子加以说明。甘肃省武威县新鲜乡新城村是一个满族人口将近一半的村子，仅在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的1979年到1981年间，生产、生活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日值由1元提高到1.58元；平均每人现金收入由112元增加到190元。素有“人参之乡”美称的辽宁省桓仁县，是历史上满族祖先挖棒槌营运之地。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满族传统的民族经济之一——人参养植业大发展。目前，该县不仅有规模巨大的国营参场、县地方国营参场、乡办和村办集体参场，还有许多个人参场。1984年，有人参35万多帘，按全县总人口计算人均一帘以上。其中满族农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人参，收入大幅度增加。